

涉税案件集中管辖模式下 民事涉税案件受案识别标准初探

——以涉税案件“三合一”集中管辖的厦门模式为例

李刚^{1,2}, 张轶男¹

(1. 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福建 厦门 361010)

[摘要] 民事涉税案件的多寡是支撑涉税案件“三合一”集中管辖模式得以持续的关键性客观因素。以实施涉税案件“三合一”集中管辖的厦门模式中目前民事涉税案件案由规定为基础, 结合有关税务司法实践, 可以提炼形成三大识别标准: 一是原告或者被告为税务机关且争议焦点涉税; 二是在税务机关非为任一方当事人情形下, 原告的诉讼请求涉税; 三是除前两种情形之外, 从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可以初步判断税收问题与案涉主法律关系具有逻辑关系。从2018—2023年累计60件年度中国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和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3年度963件民事案件中分别筛选出23件和11件民事涉税案件加以类案分析, 验证了上述三大识别标准的有效性并得到了进一步改进的启发。为此, 应当拓展改进目前的民事涉税案由规定, 结合法院立案分案的流程, 实现民事涉税案件从无到有, 进而稳步增长的目标。

[关键词] 民事涉税案件; 识别标准; 受案范围; 集中管辖

[中图分类号] D 922. 22; D 9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5) 01-0032-14

自2023年11月28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思明法院”)涉税案件合议庭(以下简称“涉税合议庭”)挂牌成立, 实施民事涉税案件、税务行政案件和涉税刑事案件“三合一”集中管辖以来, 思明法院已先后于当月和12月审理了第一起税务行政案件和第一起涉税刑事案件, 但至今(2024年10月)尚未审理过民事涉税案件。笔者认为,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明确涉税案件集中管辖相关案由的通知》(厦中法发〔2023〕78号)(以下简称《厦门涉税案由通知》)中规定涉税合议庭审理的民事案由过于狭窄, 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民事案由, 并分步推进改革, 逐步实现涉税合议庭审理的民事涉税案件从无到有、从有到稳步增长、从思明区到全市的基本态势。

一、民事涉税案件识别标准的探索

涉税合议庭能否实际受理民事涉税案件及其数量的多少, 取决于在海量的民事案件中如何识别出其“涉税”因素并衡量该因素在当事人诉求中的分量。为此, 在目前《厦门涉税案由通知》有关民事涉税案件案由规定的基础上,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根据法〔2020〕347号第二次修正)中的相应案由, 本研究提出如下民事涉税案件的三大识别标准。

(一) 识别标准一: 民事诉讼当事人^{①[1]}之一为税务机关

1. 《厦门涉税案由通知》确立的现有民事

[收稿日期] 2024-10-21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国首个涉税案件‘三审合一’集中管辖机制研究”(FJ2024A006)

[作者简介] 李刚(1976—), 男, 江西南昌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税法研究。

① 民事诉讼当事人指民事诉讼程序中以自己的名义要求法院对该争议作出裁判的人及其相对人, 受法院裁判之约束, 此处当事人亦包括第三人。

涉税案件案由。根据《厦门涉税案由通知》第 2 条，涉税合议庭目前应予受理的民事涉税案件的民事案由主要系税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 238 条^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 号）第 302—307 条提起的诉讼，主要为《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 11 部分“特殊诉讼程序案件案由”下的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诉，具体包括：执行异议之诉，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和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其中，执行异议之诉又包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经“北大法宝”检索，在高级检索的“案由”部分选择“民事－特殊诉讼程序案件－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当事人为“税务”，审理法院为“厦门市”，未能检索到符合条件的案件。检索范围扩大至福建省辖区，发现以税务机关为一方当事人的执行异议之诉 3 例，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 0 例，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 9 例，去除裁定撤回起诉、无法判断具体案由的案例，可供研究案例共 10 例。加上经笔者在思明法院实地调研获得案例 2 例（案例 1、案例 6），共计 12 个案例（见表 1）。

表 1 福建省辖区内执行程序异议之诉涉税案例

序号	案号	审级
1	（2023）闽 02 民初 1022 号判决书	一审
2	（2023）闽 03 民终 3523 号判决书	二审
3	（2023）闽 09 民初 93 号判决书	一审
4	（2023）闽 09 民初 92 号判决书	一审
5	（2023）闽 09 民终 703 号判决书	二审
6	（2022）闽 02 民初 1203 号判决书	一审
7	（2021）闽 0505 民初 2086 号判决书	一审
8	（2021）闽 08 民申 20 号裁定书	再审
9	（2020）闽 0423 民初 286 号判决书	一审
10	（2020）闽 0426 民初 2604 号裁定书	一审
11	（2020）闽 0426 民初 2603 号裁定书	一审
12	（2015）最高法民申字第 3356 号裁定书	再审

由表 1 可知，从诉讼主体的角度出发：（1）税务机关作为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的案例共 8 例，其中 5 例涉及税收优先权；不涉及税收优先权的 3 个案例中，2 例为执行异议之诉，1 例的争议焦点系申请人是否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2）税务机关作为原告（上诉人、申请人）的案例共 3 例，2 例涉及税收优先权，另 1 例系关于原审中的证据伪造。（3）税务机关作为第三人的案例 1 例，主要争议焦点与税务机关的关联关系较弱，主要为债权清偿问题。所有 12 件样本案例中，不涉及税收优先权的案例共 5 例，其中 4 例为执行异议之诉（见表 2）。

表 2 福建省辖区内执行程序异议之诉涉税案例类型化区分

分类	分类标准	税务机关主体诉讼地位	子分类	数量
分类一	诉讼主体涉及 税收优先权	被告税务机关 （被上诉人、被申请人）	涉及税收优先权	5
			不涉及税收优先权	3
		原告税务机关 （上诉人、申请人）	涉及税收优先权	2
			不涉及税收优先权	1
		第三人税务机关	不涉及税收优先权	
分类二	诉讼主体不涉及 税收优先权	-	执行异议之诉	4
		-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1

① 《民事诉讼法》第 238 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 15 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需要说明的是,表1中案例1系在思明法院涉税合议庭挂牌成立前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立案,诉讼标的额合计超过5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21〕27号)第1条规定^①,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因此,该类典型的涉税执行异议之诉由于级别管辖的缘故,即使出现在涉税合议庭挂牌后,也无法纳入其受案范围。这就牵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厦门中院若作为一审法院,应否也采取涉税案件集中管辖模式,同时亦可与思明法院一起,形成涉税案件集中管辖的两审模式。

目前,税务机关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主张税收优先权主要有以下方式:(1)向执行法院提交参与分配书或发函要求参与执行款项的分配并优先清偿。(2)通过提起执行异议或者针对执行法院制作的财产分配方案提起异议的方式主张税收优先权。(3)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执行法院协助从执行款项中优先扣缴被执行人的欠税。但从表2中分类一诉讼主体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至少在福建省范围内税务机关多以被告的角色出现,系因税务机关在财产分配过程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为依据主张享有优先受偿权,与对方当事人或者受理法院的法理认知存在差异。例如,表1中案例2和案例3,原告(上诉人)质疑民事诉讼程序中税务机关享有的优先受偿权,认为税收优先权应仅适用于税收行政法和破产清算程序。又如,案例4的判决书指出:“人民法院民事执行程序属于民事诉讼程序,不同于行政执法程序,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而不应一体适用《税收征管法》。”案例4的原告为税务机关,其争议焦点为税收优先权的所及范围。

通过类案分析,至少可以有2点启发:(1)并非只有税务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的执行程序异议之诉才属民事涉税案件,福建省的司法实践恰恰

表明该类民事涉税案件当中税务机关多为被告身份。因此,《厦门涉税案由通知》第2条将税务机关限定为原告身份,存有改进空间,具体修改建议见后文第三部分。(2)在税务机关作为第三人的执行异议之诉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涉税因素,且争议焦点及法院的裁判说理亦未涉税,如表1的案例8和案例9,这一类型案件不应纳入民事涉税案件范围。

2. 税务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的税收代位权或者税收撤销权之诉。起诉文本不仅是当事人请求法院对纠纷予以司法裁断的意愿表达,更是纠纷得以成案并影响立案的主要路径,其中起诉文本得以成立的前提便是主体,主体适格是成案的前提^[2],同时主体也是立案审查时识别是否属于民事涉税案件最直接的依据。2001年《税收征管法》修订重颁时于第50条通过借用概念的方式首次明文援引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3],规定了税收代位权和税收撤销权,将民事债权保障制度引入了税法之中。在提起税收代位权和税收撤销权之诉时,税务机关不再以行使“公权力”的角色出现,而是处于与对方当事人平等的地位,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相对平等的法律关系^[4]。在我国现行诉讼程序中,税收代位权和税收撤销权的行使只能是通过民事诉讼方式,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主要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5]。

笔者于2024年8月13日在“北大法宝”中检索税收代位权、税收撤销权案例,检索方法为:在高级检索的“案由”部分选择“民事-合同、合同纠纷-合同纠纷-债权人代位权纠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当事人为“税务”,审理法院为“福建省”,但仅检索到1起案例(表3中案例9)。在扩大检索范围至全国后,获得案例共64例,去除未审撤诉及以税务机关为被告提起的代位权案例^②后,所得可供分析案例共38例,其中前37例为税收代位权案例,案例38^③为仅有的税收撤销权案例(见表3)。

① 即“一、当事人住所地均在或者均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② 参见:郑某某、郑某等与肇源县税务局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2019)黑0622民初1477号裁定书。

③ 该系列案例共有6起,系同一税务机关作为原告针对同一被告不合理低价转让的不同房屋分别提起,本研究简化处理为1个案例。

表 3 全国范围内税收代位权、税收撤销权案例

序号	案号	审级
1	(2023) 辽 1321 民初 2796 号判决书	一审
2	(2022) 新 3201 民初 35 号判决书	一审
3	(2021) 云 0626 民初 89 号判决书	一审
4	(2021) 辽 7401 民初 1544 号判决书	一审
5	(2020) 黔 05 民终 4349 号裁定书	二审
6	(2020) 内 0781 民初 1433 号判决书	一审
7	(2020) 琼 9001 民初 412 号判决书	一审
8	(2019) 粤 0606 民初 8862 号裁定书	一审
9	(2018) 闽 0481 民初 4257 号判决书	一审
10	(2018) 京 0101 民初 13443 号判决书	一审
11	(2018) 鲁 1725 民初 3196 号判决书	一审
12	(2018) 津 0103 民初 2351 号判决书	一审
13	(2017) 粤 0606 民初 14477 号判决书	一审
14	(2017) 琼 01 民终 2605 号裁定书	二审
15	(2017) 鲁 0811 民初 8785 号判决书	一审
16	(2017) 鲁 0811 民初 8786 号判决书	一审
17	(2017) 湘 0502 民初 65 号裁定书	一审
18	(2017) 琼 01 民终 2890 号判决书	二审
19	(2016) 宁 0502 民初 2287 号判决书	一审
20	(2016) 津 0101 民初 4394 号判决书	一审
21	(2016) 浙 0784 民初 02668 号判决书	一审
22	(2016) 云民终 341 号裁定书	二审
23	(2017) 黑 0622 民初 753 号判决书	一审
24	(2016) 黑 0622 民初 1148 号判决书	一审
25	(2017) 黑 0622 民初 237 号判决书	一审
26	(2016) 黑 0622 民初 1651 号判决书	一审
27	(2016) 黑 0622 民初 1785 号判决书	一审
28	(2016) 黑 0622 民初 204 号判决书	一审
29	(2017) 黑 0622 民初 658 号判决书	一审
30	(2017) 黑 0622 民初 235 号判决书	一审
31	(2015) 天民初字第 2156 号判决书	一审
32	(2015) 沈中民三终字第 125 号判决书	二审
33	(2013) 温瑞商外初字第 33 号判决书	一审
34	(2013) 昌民初字第 15685 号判决书	一审
35	(2012) 深福法民三初字第 590 号裁定书	一审
36	(2011) 阜民一初字第 00013 号判决书	一审
37	(2005) 渝一中民初字第 137 号判决书	一审
38	(2014) 温瑞民初字第 4176 号、第 4177 号、第 4178 号、第 4179 号、第 4180 号、第 4181 号判决书	一审

上述 38 起案例中，有 31 起的法院支持了税收代位权或税收撤销权。其中，案例 23—30 为同一税务局针对不同承建单位不积极主张到期债权，以未收到工程款为由拖欠税款及滞纳金所提起的债权人代位权之诉，且法院均支持了税务机关。法院未支持税收代位权的 7 个案例，可分为 3 种情况：（1）债权人并未怠于主张到期债权或债权暂未到期，如案例 5、案例 17、案例 21 和案例 34。（2）否认了税务机关参与民事诉讼主张税收代位权的权利，如案例 8 和案例 14。（3）认为“税”并不具有普通债权的性质，不属于提起代位权诉讼的范畴，亦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畴，如案例 35。后 2 种情形法院的判决虽然有待商榷，但毫无疑问，在税收代位权案例中，法院除了需要对主债务人（欠税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加以判断外，还须对税务机关主张的税收代位权是否成立及其范围等问题加以司法审查。例如，税务机关可否仅就（税收）滞纳金（案例 17）或者滞纳金和罚款（案例 15、案例 16）提起税收代位权之诉；何种民事债权债务属于税收代位权的客体（案例 7、案例 8 和案例 18）；等等。民法和税法交织，纳入涉税合议庭管辖范围理所当然。

（二）识别标准二：主要诉讼请求涉税

诉讼请求是法院立案审查中当事人所请求的具体内容，通常在形式上直接决定判决主文的范围，以及在实质上决定被告通过法院起诉状副本等通知获得的程序保障的范围和法院审理的范围^[6]。

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20〕347 号）对相关案由确定标准的精神和原则，以“法律关系性质”+“纠纷”为主要参考点，同一诉讼中涉及 2 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个案案由；均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 2 个以上法律关系并列确定相应的案由。据此，笔者认为，从主要诉讼请求的角度，可以将税务机关非为任一方主体的民事涉税案件的识别标准，界定为当事人诉讼请求即为或者包含如下事项：第一项，税费或者税负的约定与履行，

包括税费承担、税款返还、合同价款是否含税等子项;第二项,开票事项,包括开票义务的履行与否,未开票、未按期开票、开票错误或者虚开发票所造成的损失赔偿等子项;第三项,包括除前述2项之外的扣缴义务的分担与履行和代缴税款行为等子项。据此,按照识别标准二即主要诉讼请求涉税的案件可称之为民事直接涉税案件,应当成为涉税合议庭管辖的最主要的民事涉税案件类型。

(三) 识别标准三:税收问题与主法律关系的逻辑关联

案由是民事法律关系中法律范式最为典型的体现^[7]。在诉讼请求中直接列明税之争议的情况下,可通过“诉讼请求-案由-民庭-指定分案至涉税合议庭”的方式实现集中管辖的目标。但是,前文检索结果显示,并非所有的争议问题在诉讼请求中均会有所呈现,排除二审或再审中要求撤销原判或发回重审的诉讼请求,部分案例^①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中并未提及与税相关的“诉的利益”^{②[8-9]},涉税事项“隐藏背后”或者“潜藏其中”。这一情形大致可分为2种:(1)涉及纳税义务或扣缴义务所产生的税收问题对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2)税收作为交易的经济成本对民商事合同的履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一情形下,税收问题与案涉主要“诉的利益”间具有因果、充分必要或其他重要逻辑关系。另一种情形,则是原告起诉状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部分都未提及税收问题,而是已立案后由被告提交的答辩状中阐述了税收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履行的重大影响^③。

原告的诉讼请求虽不直接涉税,但其提起民

事诉讼的前因或者后果其实与税务事项密切相关,可称之为民事间接涉税案件。需要说明的是,对上述案例是否涉税的分析,是从既有的裁判文书中才识别出其中与原告诉讼请求具有因果关系的税收因素,系“事后诸葛亮”。鉴于涉税合议庭目前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以及是否涉税的识别标准重在为立案分案提供准据,建议对民事间接涉税案件的识别和分配可分为2种情况:(1)可通过原告起诉状识别的案件,纳入涉税合议庭的受案范围。(2)通过原告起诉状无法识别的案件,在相应技术条件并未成熟的情况下,可暂不纳入涉税合议庭的受案范围。

二、民事涉税案件识别标准在民事司法实践中的验证

为了验证以上识别标准,首先,笔者从业界公认的2018—2023年年度中国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④(以下简称“年度影响力税案”)中选取其中的民事案件,分析其中的“涉税”因素是否处于以及处于何种识别标准覆盖范围之内;其次,运用以上识别标准,从思明法院2023年度民事裁判文书中筛选出民事涉税案件;最后,根据经验法则,在上述2个检索界域之外发掘符合识别标准的其他类型民事涉税案件。

(一) 2018—2023年年度影响力税案中民事案件的“涉税”因素

2018—2023年年度影响力税案共计60件,其中,行政案件27件,占比45%;刑事案件10件,占比17%;民事案件23件,占比38%。选取其中的民事案件编号制成表4。

① 例如,表4中案例8、案例17和案例19。

② 根据新堂幸司的观点,“诉的利益”指的是根据案件的具体事实关系,判断对原告请求作出本案判决是否适于纠纷解决。

③ 例如,表中4案例8,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一定期间的直播收益款11.9万元及延迟付款利息,其中未包含与税相关的事项。涉税事项即平台缴纳增值税,被告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的相关内容是在被告的答辩状中提出的。

④ 2018—2023年年度中国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系由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组织,通过全国各省市案例搜集整理、筛选提名、评选委员会投票和推荐所产生的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

表 4 典型民事涉税案例表

序号	案号	审级
1	(2023) 云 3423 民初 265 号判决书	一审
2	(2023) 新民再 4 号判决书	再审
3	(2021) 渝 0105 民初 467 号判决书	一审
4	(2023) 沪 01 民终 44 号判决书	二审
5	(2022) 津 02 民终 5942 号判决书	二审
6	(2022) 最高法民再 59 号判决书	再审
7	(2021) 粤 19 民终 10555 号判决书	二审
8	(2020) 川 0104 民初 1298 号判决书	一审
9	(2021) 粤 0607 民初 151 号判决书	一审
10	(2021) 粤 52 民终 453 号判决书	二审
11	(2021) 最高法民申 1337 号裁定书	再审
12	(2020) 赣民再 88 号判决书	再审
13	(2020) 冀 07 民终 936 号判决书	二审
14	(2020) 粤 01 民终 14452 号判决书	二审
15	(2020) 黔 26 民终 572 号裁定书	二审
16	(2019) 鄂 0506 民初 834 号判决书	一审
17	(2019) 最高法民申 3972 号裁定书	再审
18	(2019) 云 04 民终 67 号判决书	二审
19	(2017) 湘 01 民终 9719 号判决书	二审
20	(2019) 京 03 民终 12171 号判决书	二审
21	(2018) 京民再 49 号判决书	再审
22	(2017) 最高法民申 4508 号裁定书	再审
23	(2018) 冀 09 民终 4865 号裁定书	二审

以上样本案例，首先，从识别标准一的诉讼主体角度看，只有案例 20 的一方主体为税务机关（后文再予详述），其余 22 个案例的各方主体中均无税务机关，因此，需要适用后续识别标准。

其次，运用识别标准二，观察 22 个案例的诉讼请求，筛选出诉讼请求“不含税”案例 10 个，“含税”的案例 12 个^①。后者包括案例 1、案例 2、案例 3、案例 6、案例 9、案例 10、案例 13、案例 14、案例 15、案例 16、案例 18 和案例 23。其中，案例 1、案例 2、案例 6、案例 9 和案例 23 均涉及司法拍卖中的税费承担问题，诉讼请求中均有明确的涉税表达，属识别标准二的第一项，具体属该事项下的税费承担子项；案例 3 和案例 13 涉及民事交易中因实际开具了高于约定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增值税税率调整导致的税负差以及应否调整合同价格的问题，符合

识别标准二的第一项，其中案例 3 因还涉及开票事宜，同时也符合识别标准二的第二项。案例 10 和案例 15 涉及民事交易中约定由一方承担有关费用或者由双方平摊有关费用时，所谓“费用”是否包含交易所涉税款的争议，因此可归属于识别标准二的第三项。案例 14 涉及民刑交叉问题，系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所引起的税费损失赔偿诉讼，案例 18 则涉及同时作为税法法定义务和合同附随义务的开票义务，二者均属于识别标准二的第二项。案例 16 极具个性，系原告通过强制执行程序获得被告房产，并在房产过户中替被告代缴了税款，在被告的破产程序中，原告主张其代缴税款形成的债权具有优先权，可归于识别标准二的第三项。

诉讼请求“不含税”的案例 10 个，包括案例 4、案例 5、案例 7、案例 8、案例 11、案例 12、案例 17、案例 19、案例 21 和案例 22。前文提到，识别标准三是一种逻辑上的间接识别标准，通常表现为纳税义务或扣缴义务所产生的税收问题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税收作为交易的经济成本对民商事合同的履行产生的重大影响。案例 8 和案例 17 较为特殊，系因合同约定款项是否包含支付者应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而产生的民事争议，但仅从原告的诉状中难以明察其中的涉税因素，需待被告提交答辩状后才可确知涉税。除这 2 起案例外，其余 8 起案例均可通过原告起诉状（有的案例则是上诉人的上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查明案件的涉税因素。具体而言，案例 4 的争议焦点系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由买方承担房屋过户的交易税费是否包括买方签约时未能预见的卖方之一因继承所额外产生的个人所得税；案例 5、案例 11 和案例 21 是民事交易合同中常见的开具发票争议，通过原告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可以明确得出该案系由发票而起；案例 7 与前文的案例 3、案例 13 较为相似，涉及税率调整所带来的风险与收益由合同双方何者负担的问题；案例 12 涉及房地产包销合同双方主体分别按销售服务和销售不动产 2 个税目适用的不同税率缴纳增值税，在合同未就销售溢价款有关税费承担事项加以约定时就此产生的争议；

① 此处含税指诉讼全阶段，即一审或二审或再审如有其一符合诉讼请求含税，则视之为含税案例。

案例 19 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房屋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格大幅低于实际成交价格从而存在逃税行为嫌疑时，是否导致合同无效、合同应否继续履行；案例 22 系民事司法实践中罕见的税务代理纠纷，事关委托事项是代为缴纳税费还是使委托方免于缴纳税费。以上诸案，均无法直接通过原告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部分发现其涉税因素，需进一步审查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才可辨识，因此属于识别标准三的适用范围。

提炼表 4 各案所含涉税争议，类型化为 7 种，其中税费承担争议占比超过 1/2（见表 5）。

表 5 表 4 典型民事涉税案例类型化区分

分类	子分类	争议类型	数量
识别标准一		税收债权	1
		税费承担	8
识别标准二	第一项	税收债权	1
		开票事项	1
	第二项	民刑交叉	1
		个人所得税争议	1
识别标准三		税费承担	4
		开票事项	3
		税务代理争议	1

表 6 思明法院 2023 年度民事涉税案件^①

序号	案号	主要涉税争议焦点	裁判结果
24	（2023）闽 0203 民初 9849 号判决书	税款承担	支持原告有关支付代垫税费的诉讼请求
25	（2023）闽 0203 民初 15215 号判决书	开票义务	支持原告要求支付相关价款的诉讼请求，对被告以原告未履行开票义务为由不支付相关价款的抗辩不予采纳
26	（2023）闽 0203 民初 23081 号判决书	开票义务	支持原告要求支付相关价款的诉讼请求，对被告以原告未履行开票义务为由的抗辩不予采纳
27	（2023）闽 0203 民初 3128 号判决书	税款承担	支持原告要求支付多缴个税款项的诉讼请求
28	（2022）闽 0203 民初 21118 号判决书	开票义务	支持原告要求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对被告以原告未履行开票义务为由的抗辩不予采纳
29	（2022）闽 0203 民初 22160 号判决书	税费承担	对原告提出的有关过户税费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30	（2022）闽 0203 民初 13981 号判决书	开票义务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31	（2022）闽 0203 民初 13948 号判决书	税费履行	支持原告要求补缴税款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32	（2022）闽 0203 民初 14883 号判决书	开票义务	支持原告要求支付工程款项的诉讼请求，但因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发票，不予支持发票支付前的逾期利息
33	（2022）闽 0203 民初 14884 号判决书	开票义务	支持原告要求支付相关价款的诉讼请求，对被告以原告未足额履行开票义务为由的抗辩不予采纳
34	（2022）闽 0203 民初 16705 号判决书	开票义务	

综上，通过对 2018—2023 年年度影响力税案的分析验证，笔者认为，识别标准二基本可堪立案环节筛选出诉讼请求“含税”案例之用，识别标准三则需进一步考察原告起诉状中除“不含税”的诉讼请求之外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是否“含税”，至于已被分案给民庭之后直至被告提交答辩状后才出现涉税因素的案例，则暂不纳入涉税合议庭的受案范围。

（二）思明法院 2023 年度民事涉税案件的发现

本研究参照上述年度影响力税案中民事涉税案例的类案案由，在思明法院内部案例库中，于 2024 年 5—6 月，根据如下检索路径：归档日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案件类型为民事案件，立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拍卖合同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追偿权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检索获得所有民事案例共 963 件。其中，符合诉讼请求含税（识别标准二）或税收问题与主法律关系具有逻辑关联（识别标准三）的案例共计 11 件（见表 6）。

① 本表案例检索结果序号接表 4。

表 6 案例中，诉讼请求“含税”案例 3 个，诉讼请求“不含税”案例 8 个。“含税”案例分别为案例 24、案例 29 和案例 31，其中前 2 个案例的争议焦点均系因不动产过户导致的相关税费承担，案例 31 的争议焦点在于因海关审价补缴的关税和增值税的承担问题，均属识别标准二第一项。

诉讼请求“不含税”案例中，案例 25、案例 26、案例 28、案例 30、案例 32、案例 33 和案例 34 均涉及先票后款问题，系税收作为交易的经济成本对民商事合同履行产生了重大影响，属识别标准三的适用范围；案例 27 涉及房屋买卖合同中因过户由卖方（第三人）替买方（被告）代缴了原本约定应由买方承担的个税后，卖方又将该代缴个税形成的债权转让给本案原告，代缴税款债权对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产生了重大影响，属识别标准三的适用范围。

承接前文对年度影响力税案中民事涉税案例的分析逻辑，提炼并类型化表 6 案例的涉税争议类型，其中发票争议占比超过 1/2（见表 7）。从案由来看，主要以买卖合同纠纷和装修合同纠纷为主，而该两类合同争议基本属于思明法院民二庭和民四庭的受案范围^①，这就启发了笔者在思明法院内部展开搜寻民事涉税案件的方向。

表 7 思明法院 2023 年度民事涉税案例的类型化区分			
分类	子分类	争议类型	数量
识别标准一			0
识别标准二	第一项	税费承担	3
		个人所得税	1
识别标准三		开票事项	7

通过类型化分析，笔者还发现，表 6 案例的类型化排列与表 4 略有不同，后者中占比较多的为税费争议，而表 6 案例检索结果是发票争议的数量占比接近 2/3，且仅能通过识别标准三进行识别，但未出现表 4 中特殊的案例 8 和案例 17 这类无法通过起诉状识别涉税因素的案例。

① 目前，思明法院民二庭主要受理涉公司纠纷、（除民四庭受理范围之外的）涉合同纠纷等；民四庭主要受理涉不动产纠纷。

② 参见：（2019）豫 0882 民初 2819 号判决书，（2019）鲁 01 民终 4926 号判决书，（2022）苏 0115 民初 15643 号判决书，（2023）苏 01 民终 6513 号判决书（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这些案件都对超过补税本金的（税收）滞纳金是否属于破产债权作出了裁判。

（三）其他民事涉税案件的挖掘

除了上述类型的案件之外，根据长期观察税务司法实践的经验，笔者发现还有其他类型的民事涉税案件。

1. 破产程序中税收破产债权确认纠纷。表 4 案例 20 给笔者的启发是，前文的识别标准一还有改进空间，因为当诉讼主体之一为税务机关，并非只有执行程序异议之诉或者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之诉才属于民事涉税案件，税务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的税收破产债权确认之诉亦属之^②。然而，倘若由涉税合议庭集中管辖税收破产债权确认之诉，是否会与已经实现集中管辖的破产法庭的专属管辖范围相冲突，是需要妥善考虑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通知》（法释〔2002〕23 号）的有关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管辖县、县级市或者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企业的破产案件，中级人民法院负责管辖地区、地级市（含本级）以上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企业的破产案件。具体到厦门市，根据《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破产及相关案件实行集中管辖的通知》（厦中法发〔2020〕18 号）第 1 条和第 3 条，厦门市全市范围内的破产、强制清算案件等及其衍生诉讼案件均由厦门中院集中管辖，税收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之诉就属于破产衍生诉讼案件。经在“北大法宝”“威科先行”数据库检索厦门中院的破产案例，截至 2023 年底审结的与破产有关的民事案例共 225 起，未出现任何一起以税务机关为一方当事人所提起的税收破产债权确认之诉。虽然如此，但并不代表今后不会出现此类案件。从提升民事涉税案件数量以积极推动涉税案件集中管辖改革发展的角度，可以有 2 个可供选择的方案：首选方案是修改《厦门涉税案由通知》，将税务机关提起的税费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之诉纳入涉税合议庭集中管辖范围，并优先于破产案件的集中管辖；第二个方

案是维持目前厦门中院破产法庭集中管辖的模式不变，但当出现税费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件时，采取指定管辖的方式，指定由思明法院涉税案件合议庭管辖。

2. 行政协议中变相税收优惠条款引发的争议。实践中常有因地方政府越权给予变相的税收优惠承诺所引发的涉税争议。在“北大法宝”

“威科先行”及中国裁判文书网分别以“税收优惠”“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作为关键词，以“政府”为当事人，筛选 2016—2023 年的类案，剔除其中无效及重复案例，最终获得案例共计 58 件，其中民事案例 35 件、行政案例 23 件。本研究主题在于其中的民事案例，并将它们列表 8。

表 8 涉及地方税收优惠的民事案件汇总

序号	案号	主要涉税 争议焦点	裁判结果
1	(2023)京 03 民终 53 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返	二审驳回上诉，涉税协议条款违反税收相关法律规定应属无效
2	(2022)京 03 民终 16955 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返	
3	(2022)黑 0421 民初 820 号判决书	协议承诺核定征收低税率	一审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核定征收转为查账征收致使合同履行不能，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4	(2021)苏 0891 民初 1111 号、 (2021)苏 08 民终 2585 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奖	一审二审均驳回诉讼请求
5	(2021)闽民终 42 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返	一审二审均驳回诉讼请求，涉税协议条款合法有效
6	(2020)浙 0881 民初 1029 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奖	一审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涉税协议条款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系合法有效
7	(2020)云民终 733 号判决书	合同涉及先征后返	二审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涉税合同条款违反税收相关法律规定应属无效
8	(2020)皖 16 民终 1938 号判决书	合同涉及先征后返	二审驳回上诉，涉税合同条款违反税收相关法律规定应属无效
9	(2020)黔 03 民终 3231 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返	二审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涉税协议条款违反税收相关法律规定应属无效
10	(2020)闽 06 民终 1235 号判决书	涉及合同项下 税款赔偿	二审驳回上诉，赔偿税款无法律依据
11	(2020)闽 0423 民初 100 号判决书	合同涉及先征后返	一审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涉税合同条款未违反法律规定，系合法有效
12	(2020)鲁 01 民终 3990 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返	二审支持上诉人部分诉讼请求，对要求支付税收奖励部分不予支持
13	(2019)新民终 369 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返	二审驳回上诉，涉税协议条款未违反法律规定，系合法有效
14	(2019)皖民初 8 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返	一审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涉税协议条款未违反法律规定，系合法有效
15	(2019)皖 12 民初 484 号裁定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奖	一审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案涉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
16	(2019)闽 08 民终 1250 号调解书	-	以调解方式结案
17	(2019)辽 06 民终 1048 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返	二审驳回上诉，涉税协议条款未被证明违法或被废止，系合法有效

续表 8

序号	案号	主要涉税 争议焦点	裁判结果
18	(2019)沪0113民初11943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返	一审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法院认为不宜否定涉税协议条款的法律效力
19	(2019)川民终908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 征后返/奖	二审支持上诉请求，变更责任承担主体，但涉税协议条款并未违法，系合法有效
20	(2018)渝01民特433号裁定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返	驳回申请人的申请，涉税协议系民商事合同，未超出仲裁范围
21	(2018)渝0107民初3681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奖	一审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涉税协议条款并未违法，系合法有效
22	(2018)鲁02民终9460号裁定书	合同涉及先征后奖	一二审均驳回上诉，案涉税收财政政策具有行政色彩，不属于法院民事诉讼受理范围
23	(2018)冀0591民初40号、 (2018)冀05民终3413号判决书、 (2019)冀民申4289号裁定书	合同涉及先征后奖	一二审均驳回诉讼请求，涉税合同条款并未违法，系合法有效
24	(2018)鄂12民终82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 返及低税率承诺	二审驳回上诉，涉税价款违反法律规定，诉讼请求不成立
25	(2018)鄂12民终81号判决书		
26	(2018)鄂12民终78号判决书		
27	(2018)鄂12民终77号判决书		
28	(2018)鄂1221民初450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奖	一审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涉税协议条款符合法律规定，系合法有效
29	(2017)苏0812民初2698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奖	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涉税协议条款系国发〔2014〕62号出台前签订，且国发〔2015〕25号文明确已签订的税收优惠政策继续有效
30	(2017)鲁14民终2623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返	二审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涉税协议条款合法有效，且前期已经履行，不存在无效基础
31	(2017)桂0603民初1647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返	一审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国发〔2015〕25号文明确已签订的税收优惠政策继续有效
32	(2017)鄂12民终992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返	二审维持一审中涉税事项处理，返还税款事项系双方协议约定，并无不当
33	(2017)鄂0112民初4342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奖	一审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国发〔2015〕25号文明确已签订的税收优惠政策继续有效
34	(2017)川13民初17号判决书	协议涉及先征后返/奖	
35	(2016)闽0423民初711号、 (2017)闽04民终581号判决书	合同涉及先征后奖	二审驳回上诉，涉税合同条款并未违法，且当事人已履行规定义务，应予履行税收奖励

观察表 8 中的案例，除案例 5 和案例 20 外，其余的民事案由均为合同纠纷。案例 5 和案例 20 虽未以合同纠纷的形式体现，但在其裁判文书中同样可以发现“协议书”等字眼。地方政

府越权制定税收优惠规范而引发的诉讼，只能是（涉税）行政诉讼。但围绕地方政府在行政协议中承诺给予对方变相税收优惠待遇（在形式上多表现为“免征/不征”“先征后返”“先征后

奖”“低税率承诺”等)而引发的诉讼,检索结果显示,长期以来既有民事诉讼也有行政诉讼。这一局面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出台,才得以基本改观。表8的类案检索结果显示,2020年1月1日该文生效后案件共计11起,其中5起案例系已进入审理阶段或此前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尽管仍然存在部分以民事案由进行的诉讼纠纷,但民事受案数量相较于规定出台前已大幅降低。表8中的案例,大体可分为3种情况:(1)地方政府作为一审原告的案例,系地方政府尝试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要求企业返还已兑现的代垫税款或者财政返还款项,或者以确认原行政协议效力为由请求合同的继续履行,或者因行政协议对方未履约而试图解除协议。因地方政府无法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行政诉讼,故只能借助于民事诉讼的方式,如案例1、案例2、案例5和案例14。(2)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招商平台公司与投资者签订招商协议所生争议的民事纠纷,其中既包括地方招商平台公司作为原告的情形,如案例18,也包括其作为被告的情形,如案例4和案例23。(3)两个民事主体之间由于地方政府取消其税收优惠措施而致其原先达成合意的民事合同无法履行,如案例3。以上3种情况,所诉争议焦点大多针对地方政府废止其税收优惠措施或者取消其行政协议中给予的变相税收优惠承诺,可谓因税而起、由税而生,因此应当将上述民事涉税案件纳入涉税合议庭的受案审理范围中。

除以上案例外,经在“北大法宝”检索,另发现几起由厦门中院审理的一方当事人为税务机关的民事案件,案由均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主要争议焦点系讼争房屋的租赁与房屋返还^①,自然无需由涉税合议庭审理。

三、民事涉税案件案由的完善及其范围的拓展

虽然有学者检索出“涉税民事案件”年均

以数万件计^[10],但如用前文所论识别标准加以衡量,恐非如此。不过,本研究用案例检索的实证研究方式亦检验出前文识别标准的不足,因此,需要在改进这些标准的基础上,探索如何补足思明法院“三合一”集中管辖中民事涉税案件案由的缺位。

(一) 标准优化与规则完善

根据前文的分析结论,建议对《厦门涉税案由通知》的民事涉税案由部分加以修改和补充,分列三款,分别规定如何适用识别标准一、识别标准二、识别标准三来筛选民事涉税案件。

第一款规定识别标准一。根据前文第一、二部分的研究结论,首先,不应将税务机关仅限定为原告身份,应扩展至其作为被告的情形,但不包括税务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的民事案件;其次,满足前者条件的同时,还应符合争议焦点涉税的要求,据此,税务机关提起的税收代位权之诉和税收撤销权之诉应当纳入;最后,对于税务机关提起的税费破产债权确认之诉,或者直接纳入涉税合议庭的管辖范围,或者由厦门中院指定由思明法院涉税合议庭管辖。该款可具体表述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第23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法释〔2022〕11号)第302条至第307条提起,原告或者被告为税务机关的诉讼,且争议焦点涉税,主要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2020〕347号)的如下案由:

(一)“第四部分合同、准合同纠纷”之“十、合同纠纷”:1.债权人代位权纠纷;2.债权人撤销权纠纷。

(二)“第八部分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之“二十三、与破产有关的纠纷”:3.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三)“第十一部分特殊诉讼程序案件案由”之“五十四、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诉”:4.执行异议之诉;5.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6.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

^① 参见:(2016)闽02民终3014号判决书、(2019)闽02民终3835号裁定书、(2020)闽02民终3130号判决书等。

第二款规定识别标准二。根据前文的研究发现, 需要对该标准补充一项, 即行政机关或者民事主体提起的以(变相)税收优惠条款为争议焦点的案件, 包括行政协议中表现为“(税款)先征后返”“垫付税款”“财政返还”“财政奖励”“财政扶持”等各种约定形式。该款可具体表述为:

通过原告的诉讼请求可以识别包含如下事项之一: 1. 税费或者税负的约定与履行, 包括税费承担、税款返还、合同价款是否含税等; 2. 开票, 包括开票义务的履行与否, 未开票、未按期开票、开票错误或者虚开发票所造成的损失赔偿等; 3. 税务代理纠纷; 4. “税收优惠”条款, 包括(税款)先征后返、垫付税款、财政返还、财政奖励、财政扶持等各种约定形式; 5. 除前四项之外的扣缴义务的分担与履行和代缴税款行为等。

第三款规定识别标准三。根据前文第二部分的研究结论, 并从立案分案的效率考虑, 应当修正为通过原告起诉(除诉讼请求之外)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可以识别出的, 案件涉税因素对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或民商事合同的履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该款可具体表述为:

根据前两款未能识别, 但从原告诉讼请求之外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可以发现第二款所列各涉税因素对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或民商事合同的履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

(二) 策略与实践指南

确立上述3个民事涉税案件的识别标准之后, 下一步便是明确立案分案的流程和步骤。立案庭通常会根据诉讼主体→诉讼请求的步骤进行分案^①〔11〕, 例如, 民事诉讼的原告为税务机关, 其诉讼请求为主张税收代位权或者税收撤销权——满足识别标准之一, 即分案至涉税合议庭审理, 由合议庭成员中的民事法官主审。但在适用识别标准一时需注意, 其不仅具有主体特征, 主要诉讼请求亦需涉税, 若税务机关起诉的诉讼请求并不符合识别标准一, 则不属涉税合议庭的审理范围。对于不具有主体特征的识别标准二, 在

进行识别、分案时更要着重于对诉讼请求的梳理和理解。

针对识别标准三, 考虑到民事案件的数量繁杂(特别是基层法院), 在立案环节一时难以通过原告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明确识别其涉税因素, 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厦门涉税案由通知》修改后, 由厦门中院及时通知各基层法院, 以便各基层法院在遇到民事涉税案件时告知当事人向思明法院申请立案。(2)公开修改后的《厦门涉税案由通知》, 并专门发送给厦门市税务局和厦门市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行业组织, 让原告尤其是原告的代理律师在申请立案之时主动提示其属于民事涉税案件。(3)在目前的立案电子系统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民事涉税案件电子识别程序, 预设识别标准二所覆盖的各类涉税字眼标签, 扫描原告起诉状后自动识别其中的涉税字眼, 再由立案庭进一步审查, 若仍然难以判断其中的涉税因素是否会对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或者民商事合同的履行产生重大影响, 则采取与涉税合议庭会商的方式来识别确认是否属于民事涉税案件。此外, 上述民事涉税电子识别程序同样可以适用于识别标准二, 而且, 在事先嵌入“税务局”“税务分局”“稽查局”等当事人名称关键词的前提下, 还可智能提示民事案件的诉讼当事人之一是否为税务机关, 从而提醒立案庭判别是否符合识别标准一。

需要说明的是, 通过前文对识别标准三所涉各案例的分析, 获得的启发是, 这些案例的争议焦点其实仍然不超出识别标准二的各项覆盖范围, 只不过从立案分案的角度来看, 原告的诉讼请求中若无明显的涉税因素, 则需要通过审查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才可揭示其涉税因素。因此, 依识别标准三在立案之初来判断民事案件是否涉税、应否分案给涉税合议庭审理, 带有一定的或然性。

(三) 形成首案, 稳步拓展

2024年6月, 思明法院受理了一起民事案件, 为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该案源于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

① 本研究所指分案, 系案件在法院内部根据不同审判庭业务的分工进行分配和流转, 不涉及案件在不同法院之间的管辖问题。

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的相关规定,有限公司(法人组织)变更企业类型为非法人组织(有限合伙)应采用解散清算并新设企业的方式进行,故存在清算补税之可能。诉求系通过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确认原告系替被告代持股份之事实,将未来可能出现之补税风险分摊至各实际股东。该案虽不直接涉税,但却因税而起,而且裁判结果会直接影响后续的税务处理。涉税合议庭经研判后,认为其作为民事涉税第一案不够典型,因此未以涉税合议庭形式审理。民二庭采用简易程序开庭,笔者旁听,庭审时果然基本未讨论涉税因素。此外,厦门市律师协会财税法专业委员会的部分税务律师也反映所代理的有关税费承担或者开票事项的民事诉讼,试图到思明法院立案未果,后在其他区法院立案。

自 2023 年 11 月涉税案件合议庭挂牌至今(2024 年 10 月),民事涉税案件一直处于缺位的状态,若长期没有民事涉税案件,对思明法院涉税案件“三合一”集中管辖的改革成效恐有影响。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建议除了由厦门中院修改《厦门涉税案由通知》以扩大其中的民事涉税案件案由和受案范围之外,可以采取以下 2 种措施:(1)了解到有典型的民事涉税案件,例如税务机关提起的税收代位权或者税收撤销权之诉,或者两个民事主体之间的开票事项争议,到其他区法院申请立案后,可以告知其向思明法院申请立案,再由思明法院向中院报告,由中院指定管辖由思明法院立案受理。(2)在思明法院管辖范围内,若发现有目前《厦门涉税案由通知》中民事涉税案由之外的典型民事涉税案件,可以由立案庭直接分案给涉税合议庭审理。

在解决涉税合议庭受理民事涉税第一案的基础上,待《厦门涉税案由通知》修改后,再稳步扩展,从而真正实现涉税案件“三合一”集中管辖的目的。

四、结 语

若以设立实施“三合一”集中管辖模式的

专门税务法庭为税务司法专业化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则其得以受理的涉税案件的数量是决定这一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客观因素。当前,税务行政案件数量极少,即便目前呈缓慢增长趋势但也极其有限,同时,涉税刑事案件数量虽整体维持高位,但地区分布不均,2024 年 1 月至今(2024 年 10 月)思明法院尚未新收涉税刑事案件。因此,唯有从海量的民事案件中运用本研究提出的涉税因素识别标准筛选出相当数量的民事涉税案件,才有可能从案件数量方面支撑涉税案件“三合一”集中管辖的必要性。这也正是本研究的主要意义所在。

(本研究得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大力支持,初稿得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曾臻法官和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一级法官助理李庆艳的指正,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 田平安. 民事诉讼法原理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22: 188.
- [2] 牟军, 薛鸿. 起诉文本的形成及在基层司法纠纷成案中的功能 [J]. 思想战线, 2021, 47 (3): 144 - 151.
- [3] 廖益新, 李刚, 周刚志. 现代财税法学要论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108.
- [4] 李刚, 程国琴. 税收代位权与撤销权的比较研究 [J]. 当代财经, 2007 (11): 29 - 35.
- [5] 杨峰. 浅议我国税收代位权诉讼中的相关问题 [J]. 税务研究, 2011 (6): 54 - 58.
- [6] 曹志勋. 民事立案程序中诉讼标的审查反思 [J]. 中国法学, 2020 (1): 283 - 303.
- [7] 袁中华. 法律关系范式之反思: 以民事诉讼法为中心 [J]. 法学研究, 2024, 46 (1): 129 - 147.
- [8] 新堂幸司. 新民事诉讼法 [M]. 林剑峰, 译注.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187, 195 - 200.
- [9] 刘君博. 论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双层理论重构 [J]. 法律适用, 2023 (12): 47 - 56.
- [10] 梁汪洋. 我国税务法院的设立: 逻辑成因与建构思路 [J]. 税务研究, 2021 (10): 87 - 93.
- [11] 兰世民, 兰馨, 缪新森. 法院分案若干问题研究 [J]. 法律适用, 2012 (6): 95 - 100.

On the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for Civil Tax-related Cases under the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Model for Tax Cases: Taking as an Example the Xiamen Model of “Three-in-One”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for Tax Cases

LI Gang^{1,2}, ZHANG Yinan¹

(1. Law School,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Xiamen Siming District People’s Court, Xiamen 361004, China)

Abstract: The number of civil tax-related cases is a key objective factor supporting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three-in-one”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model for tax-related cases. Based on the current provisions on the causes of civil tax-related cases in the Xiamen model of the “three-in-one”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for tax-related cases, and combining the relevant tax judicial practice, three major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can be refined: first, the plaintiff or the defendant is a tax authority and the focus of the dispute is related to tax; second, when the tax authority is not a party to the case, the claim in the plaintiff’s complaint is tax-related; thirdly, in addition to the first two cases, from the facts and reasons of the plaintiff’s complaint, it can be preliminarily judged that the tax issue has a log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 legal relationship involved in the case. The analogical analysis of 23 and 11 civil tax-related cases selected respectively from the cumulative 60 China Impact Tax Judicial Trial Cases in FY2018-2023 and 963 civil cases in FY2023 of the Xiamen Siming District People’s Court, verif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hree major identifying criteria mentioned above and provides inspiration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The current provisions for civil tax case causes of action should be expanded and improved,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urt’s case filing and distribution proces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ivil tax cases from none to existenc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long-term stability.

Key words: civil tax-related cases; cases accepted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scope of cases;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责任编辑 冯庆福)